

王 宁 著

比较文学、世界文学 与翻译研究

Comparative Literature,
World Literature,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人文
学术

中国当代翻译研究文库

谢天振 王 宁 主编

比较文学、世界文学 与翻译研究

王 宁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比较文学、世界文学与翻译研究/王宁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6
(中国当代翻译研究文库)
ISBN 978-7-309-10413-4

I. 比… II. 王… III. ①比较文学-关系-翻译-研究②世界文学-关系-翻译-研究
IV. ①I0-03②H③H0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39843 号



比较文学、世界文学与翻译研究
王宁著
责任编辑/余璐瑶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上海华教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19.75 字数 245 千
2014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10413-4/I·819
定价:49.8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国当代翻译研究文库

谢天振 王 宁 主编

“中国当代翻译研究文库”总序

中国的翻译研究可谓源远流长,历史上长达千年的佛经翻译不仅造就了一批优秀的佛经翻译家,同时也催生了我国古代的翻译研究和相应的翻译思想。这些翻译思想,从三国时支谦的“因循本旨,不加文饰”,到东晋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从六朝鸠摩罗什的“依实出华”,到唐代玄奘的“五不翻”,尽管多属片言只语,零篇残什,但其中蕴含着的丰富的翻译思想弥足珍贵,仍然可以为当今的译学建设提供宝贵的思想资源。像唐代贾公彦关于翻译的定义“译即易,谓换易言语使相解也”,即使从今天的译学高度看,也堪称经典。

自从严复于 1898 年提出了“信达雅”三字以后,这三个字对我国的翻译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差不多长达大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我们的翻译研究,或是讨论怎样翻译才能做到“信达雅”,或是以“信达雅”三字为标准去评判已有的翻译作品,或是探讨“信达雅”的内涵和外延,等等,几乎到了言必称“信达雅”的地步。至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虽然傅雷提出了“神似”说,钱锺书提出了“化境”说,但其思想实质,严格而言,与“信达雅”说其实并无二致,孜孜以求的也就是要解决一个“怎么译”的问题。然而与此同时,同样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在西方译学界却发生了一场根本性的变化:以奈达、纽马克、卡特福德为代表的一群学者站在语言学立场上,运用语言学的相关理论视角切入翻译研究,提出了“功能对等”、“交际翻译”、“语义翻译”等概念,刷新了两千年来的西方翻译研究的面貌,实现了西方翻译研究的第一个根本性的突破。

与西方相比,中国当代翻译研究的根本性转变,也即从传统译

论进入现代译论,具体而言,也即从仅仅关注“怎么译”的问题拓展到还要关注“何为译”、“译为何”等问题,时间上要晚一些,其起点可追溯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其时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我国外语院系的师生和专家学者第一次有机会走出国门,赴美英等西方国家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深入访问、进修学习,其中对翻译研究感兴趣的专家学者首先接触到了以奈达为代表的西方翻译研究语言学派的翻译理论,并在国内的学术期刊、大学学报上撰文评说,把他们了解到的信息传递给国内同行。这些文章部分结集成《外国翻译理论评介文集》^①于 1983 年出版,并与翌年编译出版的《奈达论翻译》^②一起,第一次比较多地介绍了外国、主要是西方以及苏联的当代翻译理论,从而为国内的翻译研究吹进了一股新风。之后,随着《外国翻译理论研究丛书》^③、《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④、《翻译与后现代性》^⑤、《当代国外翻译理论导读》^⑥等编译著述的出版,更进一步推动并扩大了当代西方翻译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与此同时,从 21 世纪初开始,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和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这南北两家外语出版社先后分别引进出版了数十种当代国外翻译理论著作的英文原版本,让中国读者可以直接面对当代西方翻译理论的英文原著,其产生的影响同样不能小觑。

①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选编:《外国翻译理论评介文集》,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3 年。

② 谭载喜:《奈达论翻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4 年。

③ 许钧主编:《外国翻译理论研究丛书》,共收入四本,分别为《当代美国翻译理论》(郭建中编著)、《苏联翻译理论》(蔡毅、段京华编著)、《当代法国翻译理论》(许钧等编著)、《当代英国翻译理论》(廖七一编著),湖北教育出版社,分别于 2000 年、2001 年出版。

④ 廖七一编著:《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译林出版社,2000 年。

⑤ 陈永国主编:《翻译与后现代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年。

⑥ 谢天振主编:《当代国外翻译理论导读》,共收入八大译学流派 33 篇译学论文译文,均配以导读文章,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 年。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当代的翻译研究也开始发生变化,并朝着实现其根本性转变的方向而发展。这种变化首先体现在翻译学学科意识的觉醒上。在此之前,尽管中国的翻译活动也称得上丰富多样,译者和译作的数量更是堪称世界之最,中国的高等院校里也都开设了翻译课程,但相当多的人包括高校的一些教师和学生对于翻译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却不甚了了。不少人依然错误地认为,翻译不过就是把别人的东西从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的实践性技能,缺乏自身的原创性,不可能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他们看不到原本在一个有限的语言环境中产生有限影响的“原创性”著述通过翻译在另一个语境里得到的更大的传播和接受,甚至产生的更巨大的影响。他们更看不到最近几十年来,翻译本身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越来越得到来自文学理论和文化研究视角的关注和考察。翻译研究借助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阐释学、女性主义以及文化研究等领域的新理论和新方法,已经突破了语言中心主义的狭隘模式,而成为广义的文化研究平台下的一个分支学科领域。翻译研究也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哲学家、语言学家、文学理论家和文化研究学者,甚至包括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的关注目光。翻译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已经成为当今国际学界的共识。与之相应,在中国经历了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关于翻译学的大讨论后,终于在 21 世纪之初翻译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已经得到了体制内的承认:目前已有 159 所高校建立了翻译硕士专业(MTI),另有一百余所高校建立了独立的本科层面的翻译系。此外,多所高校还都招收翻译学的博士生。

其次,体现在翻译研究理论意识的觉醒和跨文化研究视角的应用上。在中国,自清末民初以来的翻译研究多围绕文学翻译展开,而在文学翻译界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是:翻译是一门艺术,或者说是一种具有再创造性质的艺术,于是翻译理论也就被定位在建基于这样一种艺术实践中获取的经验之上,并反过来要求其能够指导翻译实践。由于这个原因,中国自近代以来的翻译研究,大

多是围绕着翻译实践展开的一些经验体会,并无严格意义上的理论可言。但是随着翻译学这门学科在最近几十年来的日臻成熟,当今的翻译研究开始越来越多地跳出原先局限于语言文字转换框架内的“术”的层面,而越来越多地上升到关于翻译的思想和原则的“学”的层面。这样的翻译研究成果往往能够改变人们对某种既定的翻译行为、标准、方法等的看法,导致一种新的翻译实践模式的诞生。不难想见,在当今这个全球化时代,翻译必将继续占据人类知识领域的重要位置,并在未来的岁月里继续发挥愈来愈重要的作用。因此,传统的居于对比语言学之下的翻译的定义应当根据翻译的最新发展进行修正和完善,翻译的内涵应该进一步扩大,要把翻译从纯粹字面意义的转述定义为文化层面上翻译、阐释和交际。令人感到欣慰的是,中国学者的翻译研究成果,如谢天振的《译介学》^①、《隐身与现身——从传统译论到现代译论》^②,王宁的《文化翻译与经典阐释》^③、《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④,许钧的《翻译论》^⑤等著述所作的研究,正好契合了当今国际译学的最新发展趋势,并站在中国学者的独特立场,发出了中国学者的声音。

再次,体现在对翻译史研究和翻译批评研究的高度重视上。在此之前,中国几乎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翻译史著作,对翻译史的研究同样少之又少。但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学者在翻译文学史、翻译史的编撰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迄今为止,翻译史类的著述已经超过30部。而更值得注意的是,对翻译史的研究也取得

① 谢天振:《译介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年。2013年译林出版社推出该书的增订本。

② 谢天振:《隐身与现身——从传统译论到现代译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③ 王宁:《文化翻译与经典阐释》,中华书局,2006年。

④ 王宁:《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

⑤ 许钧:《翻译论》,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

了长足的进展,王宏志的《重释“信达雅”——二十世纪中国翻译研究》^①、《翻译与文学之间》^②,廖七一的《胡适诗歌翻译研究》^③、《中国近代翻译思想的嬗变》^④等,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与此同时,作为翻译学学科三大支柱之一的翻译批评同样得到了高度重视,许钧的《文学翻译批评研究》^⑤较早在这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最后,中国学者也没有遗忘翻译研究中的语言学视角,他们同样在这一领域进行了积极有效的探索,并取得了不俗的成果,如黄国文的《翻译研究的语言学探索》^⑥和王东风的《连贯与翻译》^⑦等著述。

然而,尽管最近二三十年来我们在翻译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我们的一些学者还在国际翻译研究或文学和文化研究刊物上主持过介绍中国翻译研究的专号^⑧,但是总的说来,由于语言文字的隔阂,国际学术界对中国学者的译学研究成果并不是很了解。而由于传播的局限,甚至国内读者对于哪些学者和哪些著述能够代表中国翻译研究的前沿也不是很清楚。为此,我们决定编选一套翻译研究丛书“中国当代翻译研究文库”,集中展示中国当代翻译研究学者的代表性论著。我们将先推出“文库”的中文版,

① 王宏志:《重释“信达雅”——二十世纪中国翻译研究》,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

② 王宏志:《翻译与文学之间》,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③ 廖七一:《胡适诗歌翻译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

④ 廖七一:《中国近代翻译思想的嬗变》,南开大学出版社,2010年。

⑤ 许钧:《文学翻译批评研究》,译林出版社,1992年。

⑥ 黄国文:《翻译研究的语言学探索》,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年。

⑦ 王东风:《连贯与翻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9年。

⑧ 如王宁为 *Perspectives: Studies in Translatology, Neohelicon, Amerasia Journal,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 等十多家国际英文期刊主编了翻译研究与文学和文化研究方面的专辑,许钧与王克非也为 *META* 主持过“中国翻译实践与理论”的专号,等等。这些专辑不仅发表了数十位中国学者研究翻译的论文,同时也加快了中国人文学科国际化的步伐。

然后推出它的英文版,在国外著名出版社出版。入选本“文库”的作者应该是能够代表当代中国翻译研究的前沿,其著述不仅在国内外译学界处于领先地位,其中的一些论述也已经或者有可能引起国际学界关注,进而通过将来英文版在国际权威出版社的出版,使得中国的翻译研究进一步得到国际学界的了解和承认。在甄选“文库”的入选人选时,我们也有意考虑有不同学术背景、不同学科背景、不同外语语种的作者,尽量使入选的作者更具代表性。首批入选的六位作者既有比较文学学科背景,也有语言学背景;既有外国文学背景,还有中国文学背景。在外语语种方面,除英语外,还有俄语和法语背景的学者。入选的论文集原则上由作者本人从他已经公开发表的论文中精选出 15—20 篇的代表性论文,按内容编成三至四个部分,每本书的总字数控制在 20 万字左右。

“中国当代翻译研究文库”是一套开放性的丛书,第一辑入选的六位作者的论文集标题分别是:谢天振的《超越文本 超越翻译》,王宁的《比较文学、世界文学与翻译研究》,许钧的《从翻译出发:翻译和翻译研究》,王宏志的《翻译与近代中国》,廖七一的《翻译研究:从文本、语境到文化建构》,王东风的《跨学科的翻译研究》。在条件成熟时,我们还将陆续推出第二辑和第三辑。我们希望通过本“文库”的编选和出版(包括在国外权威出版社出版),不仅能为当代中国的翻译研究作出贡献,同时还能把能够代表中国译学研究前沿的专家学者及其代表性著述带入国际翻译研究界,让世界更直接、更快捷地了解中国的学术,让中国翻译界的学术研究切实有效地走向国门。

谢天振 王 宁
2014 年 2 月于上海

前 言

长期以来,国内外新闻界和学术界都有不少记者或学生对我进行专访,但我都很少谈及自己的学术道路,其理由很简单,我的学术道路也正如我这本专题研究文集的标题所示:“比较文学、世界文学与翻译研究”,而目前我仍然沿着这条既定的道路在稳步走着,同时又经常在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之间游刃有余。今后虽然有可能发生一些变化,但变化也许不会太大。虽然我的另外两个学科领域——西方文论和英美文学并没有被包括进这个标题,但实际上,熟悉我的著述的读者一定很容易发现,我从事比较文学研究最初也是从英美文学入手,并带有鲜明的国际性、理论性和先锋性等特征。也即我十分注重与我的国际同行进行交流和平等对话,因此我研究世界文学也着重于其理论概念的发展流变,并不面面俱到地涉及世界各国的文学。我的翻译研究最初也是从翻译英美文学作品开始,进入翻译研究领域后,又得助于先前打下的文学理论基础,所以并不涉及具体译本的翻译实践,而是从形而上的层面来考察翻译现象,最终促使这门长期游离于学术边缘的学科领域进入人文社会科学的主流话语。我想这应该是我之所以能够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并且经常在各种国际学术场合发出声音并发表著述的原因所在。

一、从英语教学步入文学研究

我也和国内不少从事英美文学及比较文学研究的同行一样,是“文革”十年的受害者。这倒不是说我本人受到了冲击,因为那时我还在南京上小学四年级,不可能像那些年长我几岁的青年学生那样卷入革命的洪流,但是我毕竟也和成千上万的少年一样深

受读书无用论的毒害，曾一度沉迷于轰轰烈烈的红卫兵运动。好在我醒悟得比较早，而且从小就养成了读书的习惯，所以在随同我的红卫兵和红小兵战友们去一些机关学校查抄时，别人都争相拣一些值钱的东西带回家，我却把一些没人要的书，尤其是中外文学名著悄悄地藏起来，用写大字报的白报纸仔细地包好埋在一个鲜为人知的地方，不时地取一两本带回家去阅读，这样不知不觉地已经读了几十本中外文学名著，中国文学名著包括《水浒传》、《三国演义》、《暴风骤雨》、《林海雪原》、《青春之歌》、《平原枪声》、《创业史》以及“文革”时期的当红小说《艳阳天》和《金光大道》等；外国文学名著则包括《基督山伯爵》、《红与黑》、《母亲》、《在人间》、《牛虻》、《双城记》、《幻灭》、《高老头》、《复活》、《安娜·卡列尼娜》、《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这些早先读过的中外文学书籍至今对我还有着一定的影响，我甚至能清楚地记得书中的主要人物的姓名和故事情节，当然，这也为我日后从事西方文学和世界文学研究打下了必要的文本阅读基础。

初中还未毕业，我就随父母下放到苏北盱眙县，并在那里读完了高中。幸运的是，我在1973年高中毕业后才下乡插队，而且下乡的时间只有两年，期间大部分时间担任中学民办教师。我很快就赶上了一个好时光：1975年邓小平主持工作时强调高校教学质量，我有幸被当地贫下中农推荐作为工农兵大学生候选人，由于我在中学读书时曾担任过班里外语课的课代表，在英语方面还有些基础，便顺利地通过面试进入了南京师范学院（后改为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英语专业学习。实际上，我们当时在大学里读书的时间并不多，短短三年的学习期间，光是学工、学农和学军就占去了大约一年的时间，此外还赶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和“粉碎四人帮”这两大政治事件。但是我那时已经认识到了自己今后的目标，因此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尽可能多地读书。但在当时那种强调政治的年代，读书也不能太公开，于是我每到一处，甚至在开会之前，总要带上一个英语单词本，抓紧每一刻时间背诵单词，或阅

读一些英语课外读物,或和同班同学用英语交谈,所以在三年的时间里,我基本上自学完了“文革”前大学英语专业四年的课程,并且记下了大量的读书笔记,也写了不少英语作文。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我当时虽然没有从课堂上学到多少东西,但却记住了不少英语单词和法语单词,这为我后来的英文写作和法文阅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因而在毕业留校后,我很快就进入了直接阅读英文原版文学作品的阶段。可以说这些都对我今天的学术研究和在国外大学的演讲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也和今天的不少外国语言文学界的同行一样,最初进入文学研究的领域是英美文学,或者更具体地说是美国文学,主要聚焦于20世纪的美国文学研究。我至今仍记得,我撰写的第一篇学术论文是研究美国短篇小说大师欧·亨利的小说创作,后来又迅速转而研究杰克·伦敦和海明威,尤其是后者对我的学术道路有着直接的影响。我也和海明威一样,开始时兴趣很广,什么都有所涉猎,但我记得海明威有一个原则,即他不管从事什么工作都必须在那个领域内位居第一,否则他宁可放弃那项事业。我在少年时代曾经是学校足球队的后卫,后来又迷上了乐器,诸如二胡、笛子和小提琴,并且都曾经达到上台演出或伴奏的水平,但后来为了全身心地学习英语和研究文学,我不得不先后把这些从小养成的爱好一一放弃了。就文学研究而言,也可以说,我是从国别文学研究逐步进入比较文学研究的。但在此之前,有两件事对我后来进入比较文学领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初,江苏省成立了美学学会,我的好友孙津在学会中担任副秘书长,他邀请我出席了几次这样的研讨会,使我在繁忙的英语教学和英文阅读中接触到另一个充满理论思辨的领域:美学和文学理论,应该说这对于我后来专攻西方文论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另一件事则更是偶然,江苏省广播电视大学需要一位外国文学教师担任学员的课外辅导,我被本校的一位老师推荐担当了这一教学任务。当时电大学员的学习条件很差,他们一般周三和周六下午集中在一个大教室里听主

讲教师的讲课录音,然后再由辅导教师进行辅导和答疑。尽管学员分散在不同的辅导站,接受不同教师的辅导,但最后的考试却是全国统一的。这对于我这个辅导教师来说,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不仅要把教材吃透,而且要能经得起学员的提问,此外还要经受全国统考的检验。这对我这个仅懂得英美文学的青年教师来说无疑又增加了许多工作量,但也正是在这样的时刻,我贪婪地阅读了英语国家以外的主要欧洲文学名著和许多文学史书籍,认真地备课,并尽可能充分地为学生讲解和答疑,最终我的努力并没有付诸东流:我所辅导的学生大部分都通过了考试。后来,我又接受了辅导学生文学概论课的任务,这便使我有机会阅读了大量的中国文学和文学理论方面的著作。可以说这些均对我从英语教学进入文学研究打下了比较坚实的文本和理论基础。我就这样走上了一条学术的不归路:从一个教书匠逐步成为一位文学研究者,更具体地说,英美文学研究者,并开始涉猎比较文学和文学理论研究。

二、从比较文学走向世界文学研究

我和国内绝大多数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学者所走过的学术道路也不尽相同:他们大多来自高校的中国语言文学系,因为就比较文学这门学科而言,它也确实是属于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之下的一门二级学科;而我则是来自外国语言文学系,从所学专业来看,应该是来自英美文学研究的。所以若描述我和比较文学这门学科的关系,我可以用这样的字眼来描绘:若即若离,分分合合,但总也无法分离。也即,我开始是比较文学学科的门外汉,直到拿到博士学位时,也还是属于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好在我从事博士后研究的单位是荷兰乌德勒支大学的比较文学系,合作导师是蜚声国际比较文学和文学理论界的学术大师佛克马(Douwe Fokkema)教授,这就使我第一次正式进入了比较文学学科的大门。回国后我仍回到北京大学在英语系任教,后来承蒙乐黛云教授不弃,聘请我在她主持的比较文学研究所担任兼职教授,总算我有了一个双重身份。1997年我离开北大到北京语言大学工作,使我正式地跨入

了比较文学学科的大门,我在那里一切从头开始,当年即着手创建了比较文学研究所,1998年领衔成功地申请到了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硕士学位授予权,2000年再度领衔并经过激烈的竞争,成功地申请到了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士学位授予权。可以说,那时我是比较文学学科内的正式成员。但就在2000年年底,我急流勇退,离开了刚刚亲手建立的北语比较文学研究所,调入了清华大学外语系,紧接着又开始了紧张的申博准备工作。我进入清华后,可以说又回到了我的老本行,英语语言文学教学和研究,我于2003年又领衔成功地申请到了英语语言文学博士学位授予权,在短短的几年内将该博士点建成北京市重点学科,并迅速地获得了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博士后流动站和博士点。为了不放弃比较文学研究,我又在清华大学创建了一个虚体性的跨院系的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尽管经历了分分合合,最终我还是和我的中国语言文学界同行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了一起,共同为繁荣中国的比较文学事业,为向国际学术界推介中国文学的优秀成果而努力奋斗。就我本人的学术生涯而言,我为什么会从英语语言文学专业走上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研究之路的呢?对此我过去虽有所袒露,但并不全面,在此我不妨多做些交代。

今天回顾起那些往事,我发现我进入比较文学界在很大程度上也纯属偶然。1985年6月,我应邀出席了在武汉举行的一次全国性的美学研讨会,在会上结识了北京大学中文系的胡经之教授,他当时和乐黛云教授一起被借调到深圳大学主持中文系和比较文学研究所的工作。在他的交谈中,我欣喜地得知,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将于1985年10月在深圳举行成立大会暨首届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此之前,还将举办全国比较文学讲习班,由国内外著名学者主讲。他建议我参加这两个活动,并在会议开始的一个多月前就给我发来了邀请信。但是尽管有前辈学人的提携,事情也并非总是一帆风顺的。由于我当时在南京师大外语系教授的是公共外语,与文学研究根本沾不上边,更不用说比较文学了,因此当我向

系领导提出外出开会和参加讲习班的申请时便理所当然地遭到了拒绝,理由是教学任务繁重,我外出期间没人替我代课,另外经费也紧张,系里无法支付我的差旅费和会务费。我自然不甘心,这可能和我的个性特征有关:我只要看准一个目标就义无反顾地往前走,即使经历失败和挫折也绝不回头。我当时已经从外籍教师送给我的一些英文原版学术著作中看到了比较文学这一新兴学科的现状与未来前景,并且为自己制定了今后的学术发展目标。于是我就毫不犹豫地把申请报告递到校长那里,并声明愿意自付一切费用,只求他同意我参加这两个活动。身为生物学家的校长归鸿教授被我对学术的执著深深地打动了,他认为很多像我这样的青年外语教师都利用业余时间出去兼课挣钱,而我却愿意自己出钱去学习,这实在是难能可贵的。于是在归校长的直接干预下,我才如愿以偿地前往深圳出席了那次比较文学的盛会,但是却失去了参加全国比较文学讲习班的机会。

1985年的深圳会议上,确实是群星璀璨,大师云集,恐怕在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史上都是空前绝后的。我除了向大会提交自己的论文外,还结识了许多比较文学界的同行,他们中的不少人后来都成了我的至交或同事。此外,我还有幸认识了对我的学术生涯发生关键性影响的三位学术大师:杨周翰教授后来成了我在北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的导师,他在我完成学位论文答辩后才匆匆离去;佛克马教授后来成了我在荷兰乌德勒支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的合作导师,并引领我进入了国际比较文学界和后现代主义研究领域;詹姆逊教授后来一直是我从事比较文学、文化研究以及全球化问题研究过程中对我产生最大影响的一位思想家和理论家。我们之间的友谊应该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他在为庆祝自己的七十大寿举行的家宴中只邀请了三位中国或华裔朋友:在杜克大学任教的刘康,当时正在美国访问演讲的作家余华和我,而我在某种程度上是专程从耶鲁大学前往杜克,和老朋友欢聚一堂的。我也正是在深圳会议之后的1986年,毅然决定报考北京大学杨周翰教授

的博士生,从此在北京一干就是二十多年。

回顾这二十多年来我所走过的道路,我确实一直未离开过比较文学。除了在外语系讲授英美文学、翻译研究和文化研究方面的课程外,我还争取用英文为本系和外系的本科生和研究生讲授比较文学导论课或作专题讲座。我除了在清华大学指导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的博士研究生外,还先后在山东大学、北京语言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指导过三十多名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的博士研究生,现在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已经成了高校的教学和科研骨干,有的甚至自己也成了教授和博士生导师。想到这些,我不禁有一种感触,即使自己再忙再累,但眼看着一代新人正在茁壮成长,因而有一种成就感。

由于我本人的学术背景,我写作的比较文学著述自然也反映了本人的知识状况。近几年来,尽管我已在多家报刊的访谈中讲述了自己的学术著述风格,但专门讲自己的比较文学研究著述的并不多。这里仅借此机会略述一二。熟悉我的著述的读者大概都知道,我从未单独写过一部比较文学导论或概论,也没有领衔主编过一部比较文学教材,这恐怕是受了我的两位中外导师的影响。但我深深地知道,我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独特之处就在于站在学科的前沿,关注理论热点和焦点话题,跨越学科的界限,将中西比较文学研究放在一个广阔的多学科和跨学科的语境下来考察。具体落实到中国文学,我选取的切入点便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因为我在这方面确实花过一些工夫,也阅读了一些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和理论著作,所以研究起来比较得心应手。和我的同行所不同的是,我必须尽力发挥自己的英语写作和演讲特长,不重复别人已经做过的工作,尽可能地利用一些国际场合来推介中国文学和文化,同时尽可能地在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比较视野下的中国文学研究论文。所以说,简单地概括我的比较文学著述风格,就是这样几个字:理论性、前沿性、跨学科性和全球本土性。也即一方面,我努力将西方最新的学术研究成果和理论思潮及时地介绍给